

关于汉唐文化的几个问题

黄留珠

(西北大学 文博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9)

摘要: 汉唐文化历史成就博大恢宏, 具有开创性、集大成性、包容性、辐射性诸多特点, 与外部世界交流交往广泛, 影响深远, 为我们提供了多方面的历史启示, 是长安学最基本、最重要的研究对象之一。

关键词: 长安学; 汉唐文化; 长安文化; 历史启示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6248(2010)02-0008-17

以汉唐都城长安命名的长安学, 虽然是涵盖面相当宽泛的学问, 但汉唐文化无疑是其最基本、最重要的研究对象之一。本文拟就汉唐文化基础层面的几个问题略陈浅见, 以为长安学研究抛砖引玉, 并求教于广大读者。

一、汉唐文化的历史成就

“文化”是一个众说纷纭的概念。20世纪50年代初, 美国学者收集到的欧美文献中关于文化的定义便已经多达160余种, 时至今日恐怕远不止这个数字了。这里, 我们不打算对文化的定义进行讨论, 而是直接运用文化系统论和文化层次论的观点, 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3个方面, 对汉唐文化的历史成就作一番简要的叙述。

(一) 汉唐物质文化

第一, 汉唐物质文化的成就, 反映在社会实业的进步方面。西汉农业生产中牛耕更加普遍, 铁农具不但在中原地区广泛使用, 而且推广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铁农具的种类也明显增加, 如铁犁就有铁口犁铧、尖锋双翼犁铧、舌状梯形犁铧、大型犁铧等多种。山东、河南、陕西等地出土的铁犁壁表明, 当

时的耕犁改革已有重大发展, 较欧洲使用犁壁要早1000多年。东汉时又出现了短辕一牛挽犁、曲柄锄、铁制钩镰等新农具, 至东汉末, 一种水力工具水碓已普遍使用于农产品加工生产。唐代耕犁更有重大改进, 出现了曲辕犁。其把过去的长直犁辕改为短曲犁辕, 使犁的重量减轻, 操纵灵活省力, 便于深耕。自此以后, 中国的步犁基本定型。在农田灌溉上, 唐代发明创造了连筒、桶车、筒车、水轮等一系列新灌溉工具, 还出现了利用架空索道的轱辘汲水机械“机汲”。在手工业生产技术创新方面, 西汉的铁器中已出现了金属组织相当良好的高碳钢和锻铁制作的兵器, 还出现了彻底柔化处理的铁素体基体的黑心可锻铸铁, 而欧洲直到18世纪才使用这种技术。河南巩县铁生沟出土的铁镬, 具有良好的球状石墨, 还有明显的石墨核心和放射性结构, 与现行球墨铸铁国家标准一类A级石墨相当。这里发现的炒钢炉说明西汉的冶铁技术已达到炒钢的崭新阶段, 在钢铁冶炼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东汉时冶炼使用的水排(即水力鼓风机)“用力少, 见功多, 百姓便之”^[1], 欧洲在12世纪才应用这一技术, 比中国晚1000多年。东汉人已经熟练掌握了层叠铸造技术, 使用石炭(煤)作燃料冶铁, 利用火井(天然气)

收稿日期: 2010-04-02

作者简介: 黄留珠(1941-), 男, 陕西西安人, 教授, 博士生导师。

煮盐。两汉的纺织技术也达到相当高的水平,1972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大量丝麻织品便是有力的证明。其中一件素纱禅衣,薄如蝉翼,轻若烟雾,重仅49克,充分显示了当时高超的纺织技艺。唐代手工业生产达到更高的水平。武则天让工人毛婆罗用铜铁铸造高105尺、径12尺、八面各径5尺的天枢,反映了冶铸技术的高超。从西安南郊何家村出土的金属器皿的切削工艺来看,盛唐可能已经采用了手摇足踩的简单车床。唐三彩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古代陶瓷技术的新发展,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1987年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越窑秘色瓷,青碧晶莹,正如唐诗所说的那样,是“千峰翠色”,制作技术极高。唐纺织技术较汉代更为进步。《旧唐书·五行志》记载的百鸟裙,“正看为一色,旁看为一色,日中为一色,影中为一色,百鸟之状并见裙中”。当时有一种轻绢,四丈才重半两。唐织造技术之高于此尽显。从出土的唐纺织品来看,其品种、花式繁多,印染精美,充分显示了非凡的大唐气象。

第二,汉唐物质文化的成就还体现在众多的发明创造方面,尤其是纸、雕版印刷和火药的发明,其意义最为重大。据《汉书·外戚传》记载,西汉将纸叫做“赫蹄”。20世纪以来不断出土的西汉纸的实物,表明当时纸作为一种物质形态确已存在。东汉蔡伦进一步改进造纸技术,生产出物美价廉的“蔡侯纸”,不仅使纸的使用进一步普及,而且逐渐形成了一套相对定型的造纸工艺。东汉末,造纸已成为一个独立的行业,其技术和设备已形成完整的体系,包含着现代造纸技术的主要环节,可视为现代造纸技术的原始形态。世界上最早的印刷术是雕版印刷。关于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年代目前尚有争议,但迄今为止所知的最早雕版印刷物为唐代的作品毋庸置疑,这就是在敦煌千佛洞发现的唐咸通九年(868)的《金刚经》。可惜此物被盗往国外,而国内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是1944年成都晚唐墓出土的《陀罗尼经》。由此可见唐代雕版印刷术已经普及。当时所印多为佛经和星占、梦占类书籍,一些著名诗人的诗集也刊行于世。唐文宗大和年间(827~835),四川及江淮一带民间已有雕版印刷的日历在市场上出售,这表明唐后期雕版印刷业已相当发达。火药也是在唐末问世的。这里所说的火药是指黑色火药,其主要成分为硝石、硫磺和木炭。最早的火药是人们在炼制丹药时无意间配制出来的。唐初名医孙思邈在《丹经内伏硫磺法》一书中,便叙述了把硫磺、硝石和含炭植物皂角及生、熟木炭放在一起烧的

硫磺伏火法,此实际上就是早期的火药配方。中唐的炼丹书《真元妙道要略》已经明确记载,以硝石、雄黄(三硫化二砷)、硫磺和蜜相合点燃,会引发强烈的火焰,这被公认为第一个原初火药的配方单。自唐末到宋初,这种能引起火焰的药方从术士之手传到兵器家手中,并被应用于实践,而火药的名字亦被广泛认知。纸、雕版印刷术和火药,都是中国古代的重大发明,其对世界文明所起的巨大推动作用自不待言。

第三,城市的繁荣与交通的发达也是汉唐物质文化成就的具体反映。西汉的京师长安,城市规模超过古罗马城3倍以上,常住人口文献记载为24万,学者据考古资料推测不少于50万,在世界城市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东汉京师洛阳,同样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之一。其他像临淄、邯郸、宛、成都等也都是两汉时期的大都市,为所在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唐都长安规模更为宏大,其南北长8651米,东西宽9721米,面积达84平方公里,分为三部分:宫城为宫殿区,皇城是中央官署所在地,外城划分作108坊,遍布寺院、府第和民宅。这里不仅是唐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且是著名的国际性大都市。其常住人口,当如唐诗所言“长安城中百万家”,不低于100万。东都洛阳是唐的第二大城市,此外像太原、汴梁、扬州、苏州、杭州、益州、荆州等都是地区性的大都市;尤其以扬州、益州最为繁荣,时人称作“扬一益二”。与城市密切相关的商业和建筑,汉唐两代也都有突出的发展与进步。汉长安有九市,唐长安有西市、东市,洛阳有南、北、西三市,这些都是商业发达的标志。当时不仅国内商贸繁荣,而且与国外的商业往来频繁,两代畅通的丝绸之路即是这种往来的重要体现;唐长安西市中甚至常年住有西域胡商和波斯、大食等外国商人。汉唐的宫殿集中体现了当时建筑技术所达到的最高水平。今考古发掘的汉唐长安宫殿遗址,规模皆相当庞大,由此不难想象当年这些皇家殿堂的宏伟壮观。从现存的唐代建筑,如山西五台县的南禅寺、佛光寺大殿,西安的大、小雁塔等,我们仍可亲眼目睹大唐建筑的风貌。汉代的陆路交通线,主要是自长安东出函谷关,经洛阳复循济渎抵定陶而直达临淄的贯通东西的干线。由此干线,延伸出三支分干线:一是自洛阳渡河,经邳县、邯郸,以通涿蓟,为东北干线;二是自陈留沿鸿沟、颍水入淮,更向南沿淝水、巢湖以达长江,为东南第一干线;三是自定陶经泗水入淮,复沿邗沟以达长江,为东南第二干线。此外还有

自关中出武关东南向,经南阳至南郡和更远的吴、楚地区的南阳南郡道;由关中通往西北的陇西北地道,即著名的丝绸之路东段;以及汉中巴蜀道(越秦岭通往汉中、四川)、北边道(沿长城的干线)、并海道(东部滨海的干线)等。当时的水路交通,除内河航运之外,海运也很发达,主要的海港都会,一是会稽郡的东冶,一是南海郡的番禺。东汉时,航线已越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甚或到红海。唐代陆路交通以长安为中心,主要有4条干线:(1)往东经洛阳、汴州达山东半岛;又自汴州北上幽州,南下扬州。(2)往西北经兰州、敦煌通西域;又自兰州经鄯州达吐蕃。(3)往西南经汉中到成都,经云州通回纥。(4)往南经襄州、谭州、衡州到广州;又自衡州通邕州。水路海运线较汉代又有扩展,不过因大运河沟通南北水道而带动国内水运的大发展,似乎更令人瞩目。

(二)汉唐制度文化

汉唐制度文化的成就,集中体现在其政治制度上,尤其职官与选官制度是最主要的方面。

两汉中央实行的是三公九卿制。所谓“三公”,西汉前期指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丞相为百官之长,总理中央行政事务,职权无所不统无所不包。太尉是执掌军事的最高长官。御史大夫位副丞相,主要掌管监察工作。后来随着中央集权政治的强化,三公名称、职掌等均有所变化,至东汉则为太尉、司徒、司空,又称“三司”。所谓“九卿”,是指三公以下中央各职能部门的长官,有太常,掌礼仪祭祀;光禄勋,掌宿卫宫殿门户;卫尉,掌宫门卫屯兵;太仆,掌舆马;廷尉,掌刑辟;大鸿胪,掌诸侯及四方归义蛮夷;宗正,掌宗室亲属;大司农,掌谷货;少府,掌皇室供养。地方实行的是郡县制。郡的长官为太守,次为都尉。太守掌治其郡,有丞为助理,边郡又设长史。都尉辅佐太守掌管军事,东汉时其职并归太守,其官省罢。县万户以上设令,不足万户置长,为一县之长官,并设丞、尉以为助理。汉武帝时于郡上设州,为监察区。州置刺史负责监察本州内郡县政务。东汉时,刺史(亦称牧)权力逐渐增大,以致演变成州、郡、县的三级地方行政体制。唐代中央实行的是三省六部制。这是由秦汉三公九卿制发展而来的一种与近现代政府结构更加接近的官僚制度。所谓“三省”,指尚书省(或称中台、文昌台、文昌都省、都台)——总理政务,长官正职为尚书令,副职为尚书左、右仆射;中书省(或称西台、凤阁、紫微省)——掌拟诏令,长官正职为中书令,副职为中书侍郎;门

下省(或称东台、鸾台、黄门省)——负责审核中书草拟之诏令,长官正职为侍中,副职为门下侍郎。所谓“六部”是尚书省所属的六个办事机构,具体指吏部——掌官吏的任免、升降、考核、赏罚,下辖吏部、司封、司勋、考功四司;户部——掌户口、土地、赋税、钱粮、财政收支,下辖户部、度支、金部、仓部四司;礼部——掌礼仪、祭祀、科举、学校教育,下辖礼部、祠部、膳部、主客四司;兵部——掌武官选授及军事行政,下辖兵部、职方、驾部、库部四司;刑部——掌司法行政及审判,下辖刑部、都官、比部、司门四司;工部——掌工匠、屯田、山泽之政令及办公纸笔等,下辖工部、屯田、虞部、水部四司。六部各设尚书、侍郎为正副长官,各部所辖各司均设郎中、员外郎为正副长官。唐地方亦实行郡县制,但郡称州(一度也曾称郡)。当时规定,四万户为上州,三万户为中州,三万户以下为下州。州长官称刺史(改郡时称太守)。县分为上、中、中下、下四等,长官均称令。京都或陪都所在的县,称京县或畿县。唐太宗时于州上设道,为监察区,长官称观察使,中唐以后演变为高一级的行政区;又于边疆要冲地区设都护府,长官称都护。唐玄宗时,于京城、陪都或行都所在置京都府,长官称尹或牧。唐初于国内重要卫戍地区置都督府,长官称都督。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节度使——一种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特别地方长官,成为安史之乱后地方割据势力(辖区即“道”),世称“藩镇”。

两汉选官途径很多,但最能代表时代精神的是察举制度。察举即考察后予以荐举。此途选官的基本步骤是:(1)皇帝下诏,指定举荐科目;(2)丞相、列侯、公卿及地方郡国按科目要求荐举人才;(3)皇帝亲自对被荐举者进行策问;(4)据对策的高下,区别授官。察举的科目,由皇帝根据需要而定,名目很多。其最为重要的有:孝廉——按照孝子、廉吏标准察举人才的科目,为岁举,并需由郡国向朝廷荐举,且有人数限制;茂才——原称秀才,即察举秀美之才的意思,东汉时因避刘秀之讳改为现名,亦为岁举,但所举人数极少;察廉——从已仕官吏中察举廉吏,为岁举;贤良方正——一种察举德才兼备者的科目,多在遇到日食、地震及自然灾害后举行,举主由皇帝临时指定,被举的人才送至京师后需经策问。唐代选官的途径也很多,不过最能体现时代潮流的是科举制度。科举是继承察举分科举士的特点而全凭考试成绩选拔人才的制度。唐科举常选类(即经常之选,多指岁举)科目,主要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

书、算等,不过人们最后所推崇的只有进士一科;制举类(即非常之选)科目,则由皇帝临时决定;另还有武举(仅实行了一段时间)。当时考试种类有口试、帖经(将所试经书掩盖,只露出一行,中间遮住三个字,让考生把遮住的字写出)、墨义(关于经义的问答,又称问大义)、策问(提出若干有关治国方略、时事政治方面的问题,由考生回答)、诗赋(大都为五言六韵的排律,诗体称试帖诗)。考生一类是生徒,即朝廷所设各类学馆及地方州县学馆的学生;另一类是乡贡,即不在学馆而被举贡者。科举的预备试,生徒在学馆内进行,乡贡的士子需先持身份、履历证书到州县政府登记报名,然后由州县逐级考试。预备试合格者,方能赴京参加正式的科举考试——由礼部主持的省试。应试之日,考生自带水、炭、蜡烛、餐具等,经检查进入考场;答题时间以一日为限,至晚仍未交卷,允许燃烛三条;试卷一般不糊名。省试被录取称“及第”,被录取者相互称“同年”,第一名叫“状元”。唐时科举及第,只是有了出身,即具备了做官的资格,要进一步真正做官,还得经过吏部或兵部的再选试,称为铨选。

(三)汉唐精神文化

汉唐精神文化的成就,体现于众多领域,兹分别介绍如下:

1 自然科学

两汉天文学十分发达。《淮南子》、《汉书·五行志》关于太阳黑子的记录,比欧洲要早 900 多年。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五星占》中有五大行星运行的记载,其中关于金星会合周期及恒星周期测值的精确度令人吃惊。西安交通大学汉墓发现的以写实为主的二十八宿图,是世界上最早的星图。《史记·天官书》、《汉书·天文志》均较全面、系统记述了当时的天文学成就,在世界天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当时不仅造浑天仪,铸铜为像,建灵台,以观天象,而且对天体结构提出多种学说,出现了如张衡那样伟大的天文学家。天文学的发展有力促进了历法的进步,西汉已产生了《太初历》、《三统历》一类精密的历法,东汉末所造《乾象历》,已提出了日食、月食的算法。一行和尚对天文历法做出的贡献,反映了唐代在这一领域的成就。他使用与梁令瓚共同创制的黄道游仪,发现了恒星位移现象,比英国天文学家提出的恒星自行观点早近一千年。他又是世界上首位用科学方法实测子午线的人,较外国人早近一个世纪。他还修制了先进的《大衍历》。从敦煌石窟中发现的唐代星图(约 940 年),绘有 1 350 多

颗星,而西方在公元 1 608 年发明望远镜之前的星图最多只有 1 022 颗星。与天文历法密切相关的算学在西汉正式形成,《九章算术》是两汉算学最优秀的成果。其中第一次记载了负数概念和正负数的加减运算法则,而印度人到公元 7 世纪以后,欧洲人到 16 世纪以后,才开始有较明确的负数概念。还有关于联立方程的解法,法国数学家到 16 世纪才得出同类解法。唐代李淳风等人注释《周髀算经》、《九章算术》等书,并集成《算经十书》,为算学典籍的集大成之作,标志着当时算学的新发展。《十书》对保存中国古代数学著作做出了贡献,其中所使用的数学名词,如分子、分母、开平方、正负、方程等沿用至今。西汉名医淳于意(仓公)“治病,必先切其脉”^[2],可见当时脉学已有较大发展。中国劳动人民所创造的独特疗法——针灸,这时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满城汉墓出土的金针和银针,充分说明了针灸使用的普遍性。此期出现的《黄帝明堂经》等较系统的针灸学著作,表明其理论的不完善和成熟。长沙马王堆女尸和湖北江陵男尸,在地下埋藏 2 000 余年,基本完好无损,说明当时防腐技术已相当先进。东汉名医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把中医临床治理提高到了一个水平,号称医圣。另一名医华佗,精于外科手术,发明了一种口服全身麻醉药麻沸散,为世界医学史上的杰出成就。唐代医学分科已有杂疗、痲疮、少小、耳目、口齿、角注等。显庆四年(659)颁行的《新修本草》,是世界上首部由国家颁布的药典,比欧洲最早的佛罗伦萨药典还要早 800 多年。此书开世界药学著作图文对照的先例,所载用白锡、银箔、水银合成银膏作为牙科补充剂,是世界上最早使用汞合金补牙的记录,先于西方 1 000 余年。当时名医辈出,以孙思邈最具代表性,世称药王。他有关脚气病治疗和预防的论述,较欧洲早 1 000 多年。

2 哲学思想

汉初盛行黄老思想,并形成黄老政治,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十大经》、《经法》、《称》、《道原》等为其提供了具体的实物依据。汉武帝时,独尊儒术,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公羊派儒学走红。董氏提出的“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说,为其后谶纬迷信思想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西汉末,谶纬开始盛行;及刘秀“宣布图谶于天下”,这种迷信越发兴盛起来,被称为“内学”。作为谶纬迷信的反对派,桓谭等人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特别是王充,更是反对谶纬、批判唯心论的旗手,所著《论衡》,是中国唯物主

义思想史上的不朽之作。唐代唯心、唯物两种思想都有新的发展。韩愈反对佛教但又吸收佛教思想,提出“道统”问题,建立了新的儒家理论,开宋代道学之先声。其弟子李翱,仿效佛教的修行来改造儒学,提出了“复性”说,要求人们灭掉情欲,从“弗思弗虑”中求得“至诚”的境界。柳宗元认为,宇宙无极,元气浑然其中,天地、元气、阴阳没有意志,不可能赏功而罚过。他主张重视人事,不要空谈天命鬼神。这些既是对天命论的批判,也是对无神论唯物思想的发展。刘禹锡进一步补充了柳宗元关于天的唯物主义思想,提出了颇具辩证因素的“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的著名学说,对唯物主义发展做出了新贡献。

3 文学艺术

赋与乐府诗,是两汉文学的主要方面。汉赋分骚体赋与散体大赋两种,是典型的宫廷文学。前者盛行于汉初,代表性作家有贾谊、枚乘等。后者全盛于武帝至成帝间,著名赋家有司马相如、扬雄、东方朔等。“乐府”为掌管音乐的官署。武帝时,开始大规模采集各地民歌。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西汉乐府采集的民歌就有138首之多。这些民歌以五言居多,还有三言、四言、七言。其语言朴实,形象鲜明,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和民众的呼声,是汉文学中的瑰宝。两汉传记文学成就也很突出,《史记》、《汉书》虽为史书,但亦是一流的传记文学作品。在散文创作上,贾谊、晁错、王充的说理散文,刘向的记事散文,都达到极高的水平。东汉时文学大体已与儒学分离,成为文士的一种专业。另外,原先只在民间流行的五言诗开始兴起,成为诗作的重要体裁。唐代是文学大繁荣的时代,而其中尤以诗歌最为光彩夺目。仅清人所编《全唐诗》,即收集了2300多位诗人的48900多首诗作,其数量之大,内容之广,均属空前。李白、杜甫、白居易是唐代诗人最杰出的代表。唐代还掀起了一个力图使文体、文风和文学语言较为适应时代要求的文学革新运动——古文运动。其奠基者是初唐的陈子昂,主将是韩愈。唐中后期产生的传奇小说,标志着中国古典小说开始脱离萌芽状态而发育成形。另外,唐时变文盛行,反映了俗文学的新发展,其对以后宋人的话本及民间弹词说唱有很大的影响。汉代宫廷有专门画工负责绘画,统治者也常以绘画点缀政务。今可见到的汉画以壁画和石刻画为大宗,前者如洛阳卜千秋墓、和林格尔墓壁画等,后者如嘉祥武梁祠、肥城孝堂山祠石刻画等。墓葬帛画也非常典型,如马王堆一、三号墓

和临沂金雀山九号墓出土的帛画等。这些作品都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平。唐代绘画,无论是山水画、人物画,还是花鸟画、禽兽画,均有很大的进步。当时名画家辈出,其中成就最为突出的要数吴道玄(又名吴道子),被称作“画圣”。此外,寺院、石窟、陵墓的壁画,亦构成唐代绘画艺术的重要方面。现存者以敦煌莫高窟壁画最为著名。汉代书法以隶书为典型,代表作如熹平石经等。其篆书在秦篆的基础上有所发展,而草书仅处在初创阶段。唐代是书法艺术的黄金时代,楷书、行书、草书各种书体都取得重大进展,且各种书体均出现了影响深远的著名书法家,其中以颜真卿、柳公权最负盛名,其书体世称“颜筋柳骨”。汉代雕塑艺术较前有了多方面的进步,其作品今可见者,石雕以茂陵霍去病墓石雕群为代表,陶雕以阳陵彩俑及杨家湾、狮子山兵马俑为代表,铜雕以武威雷台奔马为代表。唐雕塑作品之中,寺庙、石窟的佛教造像占有很大的比例。这些佛像造型优美,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再就是陵墓前的一些雕刻品,如著名的浮雕“昭陵六骏”,乾陵、献陵、顺陵、桥陵的侍臣、龙马、犀牛、狮子、天鹿、鸵鸟石雕像等。汉世盛行楚乐、楚舞。自武帝以后,乐府机构不断扩大,乐工达千人之多,乐人职掌类别达五十余种。帝都所在的关中,民间仍然流行秦声。著名音乐家有李延年等。当时最流行也最具代表性的舞蹈是《七盘舞》,较常见的还有《巴渝舞》《剑舞》《巾舞》《踏鞠舞》《鞞舞》《沐猴舞》等。唐代乐舞在民族融合及吸收外来文化的基础上,更加风格多样,优美和谐。太宗时定乐为十部,其后乐又分为坐部伎(六种)和立部伎(八种)。当时著名的音乐家不仅有中国人,而且有外国人,甚至玄宗皇帝在此领域也颇有作为。舞蹈分为健舞和软舞两类。前者舞姿雄健,舞曲有剑器、胡旋、胡腾等;后者舞姿柔软,舞曲有凉州、回波乐、鸟夜啼等。盛唐流行霓裳羽衣舞,白居易《霓裳羽衣舞歌》对其有非常详尽的描述。

4 经学与教育

汉武帝独尊儒术,立五经博士,在京师设太学,地方设郡国学,教授儒家经典。当时通行的经书系用汉隶写成,称“今文经”,后来又发现了用汉以前文字书写的经书,称“古文经”。随着经学与教育的发展,解经的派别越来越多,加之今古文的不同,矛盾就更多,汉宣帝时举行石渠阁会议,力图统一经义的解释。西汉后期,经今古文学的矛盾斗争进一步

激化,古文经学者争立学官的呼声日趋高涨,他们强烈要求打破原来朝廷所立博士全是传授今文经学的局面。王莽时,古文经学终于取得了合法地位。东汉之世,今文经学仍然是官方学术的主体,而古文经学一直未立博士。从发展来看,今文经日趋衰落,古文经日渐兴盛,当“郑学”形成,则完全占了上风。不过,这时的古文经学,已经杂糅了今文经学,是一种古、今文合流的经学。必须指出的是,章帝朝举行的白虎观会议,用讖纬来正经学,用官方意志来正经学,从而使经学与讖纬迷信更紧密结合,以为封建统治服务。唐代中央一级属国子监领导的学校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广文馆、律学、书学、算学,不属国子监领导的学校有弘文馆、崇文馆、崇玄学、医学、小学,另还有中央各业务部门兴办的专业学学校。地方学校主要是府、州、县学,且与科举制度紧密结合。由于科举考试的需要,推动当时经学在考订、解释经文两个方面取得了明显的发展。《五经定本》《开成石经》《五经正义》即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官定经书课本和士子解经的依据。

5 史学

汉代是史学的创新时期。司马迁的《史记》,开中国纪传体史书的先河,使史书的撰著体例更加适应时代的需要。班固的《汉书》,则是纪传体断代史书的鼻祖,以后的正史皆沿用其例。唐代是史学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此前史书大都是私家著作,自唐开始设立史馆,指定专人编修前代和本朝国史,并令宰相监修。其后,官修正史作为一种制度沿袭下来。有唐一代,修史特别多,在所谓的二十四史中,即占八部。

6 宗教

汉代的宗教主要是早期道教和刚刚传入的佛教。早期道教分为两大派别:一是曾经领导过黄巾起义的太平道;一是曾经在汉建立过政权的五斗米道(又称天师道)。佛教约在西汉末传入中国,汉明帝曾派人去印度访求佛法,后从大月氏请回印度僧人,并在洛阳建白马寺。不过,佛教自传入中国之始,便与中国文化相融合,进而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唐代佛、道二教都很盛行。唐朝皇帝以道教教主的后裔自居,积极扶植道教。佛教在唐代形成了诸多宗派,以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和禅宗影响最大。当时,佛、道二教斗争一直相当激烈,而世俗地主阶级的反佛斗争亦不时发生。随着唐朝对外关系

的发展,更多的外国宗教相继传入,如祆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等。

二、汉唐文化的特点、繁荣的原因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一)汉唐文化的特点

汉唐文化给人留下的印象,似可用“博大恢宏”加以概括,总观其特点,约有以下几项:

1 开创性

众所周知,中国古史发展的里程中,秦汉、隋唐是两个具有开创意义的时代。然而由于秦、隋两代短祚,所以这两个时代的开创性成果主要体现在汉、唐。惟此,就决定了汉唐文化的开创性特点。事实上,这种特点在汉唐文化的各个层面都有所反映,其中最为突出的,如物质文化方面纸、雕版印刷、火药的发明,制度文化方面三公九卿制、三省六部制、察举制、科举制的实施,精神文化方面独尊儒术、纪传体史书的出现与官修史书、道教的产生与被皇家尊崇、佛教的传入与各宗派形成等等。上述这些文化史实,皆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开创性贡献或事件。

2 集大成性

这与上述开创性紧密相关。因为汉唐文化的开创性不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而是其长时间文化发展积累的结果。这里,以往的文化积累是量变,而汉唐文化的开创性则是由量变积累而出现的质变。从这种意义讲,汉唐文化的开创性,正是对以往文化集大成性的升华。这样就使汉唐文化具有开创性特点的同时,又具有集大成性的特点。具体言之,如汉代铁农具的普遍使用,显然是自铁器出现以来的集大成性成果;唐代出现的曲辕犁同样是自有耕犁以来的集大成性成果。再如蔡侯纸的问世,当是汉代人不断总结、改进造纸技术后产生的集大成性成果;雕版印刷的发明,是人们总结印章原理,并加以扩大而出现的集大成性成果。总之,所有汉唐文化的新现象、新发明、新事物,几乎无一不是如此。

3 包容性

此指汉唐文化所具有多民族融会和中西融会的特特点。中国自古便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族之间虽有矛盾斗争,甚至兵戎相见,但和睦相处、相互融合始终是发展的主流。汉王朝诞生于春秋战国时期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等族与华夏族的融合之后,唐帝国则建立于十六国南

北朝时期以匈奴、鲜卑、羯、氐、羌为主的诸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之后,所以汉唐文化必然带有多民族融会的特征。汉唐又都是同外部世界交往频繁的王朝,著名的丝绸之路把帝国与西方互相联系起来,从汉唐两代对所谓胡乐、胡舞、胡妆、胡食、胡风的喜好追求,到以佛教为代表的外来宗教对中国社会所产生的多种影响,无不反映了汉唐文化的中西融会的特征。多民族融会和中西融会,充分体现了汉唐文化的包容性。

4 辐射性

汉唐文化不仅吸纳外来文化的营养充实自己,具有鲜明的包容性,而且其本身也远播域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具有辐射性——或曰远距离传播的特点。大家知道,中国古代诸王朝中,汉唐是最令人引以为骄傲的时代,以致今天我们还用“重振汉唐雄风”这样的口号来自勉自励。两汉历时四百余年,国家统一,国力强大,与中亚、西亚、南亚、东南亚、东北亚,乃至地中海沿岸的欧洲国家均建立了联系。汉与并存的世界大国——贵霜帝国、安息王国、罗马帝国等相比,在政治制度、科学技术等诸多领域占有明显的优势。惟此,汉文化对外具有强大的辐射力。汉的丝绸、铁器、生产技术、文化典籍等,经由各种渠道传往域外,其声威亦随之远播。汉文化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在至今犹存的许多事实中仍可以清楚地看到,例如汉族之称,即因汉帝国而得名,“自兹以还,虽朝号屡更,而族名不改”^[3]。再如汉语、汉字等等,亦无不如此。甚至英雄人物,也以“好汉”相称。唐历时近三百年,“三代以还,中国之盛,未之有也”^[4]。其疆域远远超过汉朝之版图,与之通使交往的国家多达七十余个,地区涉及亚、非、欧三大洲。当时,欧洲正处在“中世纪的黑夜”,与唐并存的世界大国中以阿拉伯帝国最强,但其基础很不稳固,惟有唐帝国处在鼎盛时期,是一颗璀璨无比的明珠,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文明中心。这样,其文化的辐射力自然就更为强大。唐文化的深远影响,直到今天我们还能明显感受到,如世界上的华人居住区被称为“唐人街”或“唐城”,便是极好的例证。

(二)汉唐文化繁荣发达的原因

当剖析了汉唐文化的特征之后,再来考察一下汉唐文化之所以繁荣发达的原因,显然是很有必要的。根据我们的研究,其主要原因当有以下几点。

1 汉唐国家的大一统

汉唐两代都是中国历史上典型的大一统王朝。汉帝国的疆域,东至今东部沿海和朝鲜半岛北部,北

到呼和浩特一线,西到巴尔喀什湖及锡尔河上游一带,南到海南岛与越南北部^[5]。唐帝国的疆域东曾至朝鲜半岛南端(熊津都督府),东北曾至撒哈林岛(黑水都督府),以及外兴安岭以远(室韦都督府),西曾至咸海西岸一线,最西至扎博勒(波斯都督府),北曾至贝加尔湖以远的勒拿河、叶尼塞河上游地区(余吾州、坚昆都督府),南至越南北部(安南都护府),较汉代更有所扩大^[5]。如此广袤的土地由一个中央政权统一领导,有效地行使管理职能,这就避免了小国林立或分裂割据所容易引起的诸如战乱之类的弊病,使民众有一个相对安定的生存环境,从而给文化活动创造了良好的先天条件。再者,在大一统的情况下,便于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也非常有利于文化的发展。如前文叙述汉唐物质文化成就时所介绍的汉唐两代构筑的堪称发达的水陆交通网,如果不是在统一的国度里很难设想能够完成这样的大工程。而正如大家所熟知的那样,发达的交通有利于文化的交流,是促进文化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

2 汉唐时期各民族的交融以及中外之间的交往、交流

生物学的理论告诉我们,杂交的品种一般都要优于非杂交的品种。这种生物效应同样存在于文化现象之中。这就是说,民族的交融,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交流,对于文化的繁荣发展大有好处。汉唐时期,对于民族关系的处理,总的来说是比较宽容的,没有那么多的歧视。汉武帝有一个大臣叫金日磾,便是匈奴人,汉武帝临终,还托孤于他,足见重用。唐代大臣中的少数民族人氏更是常见。据不完全统计,唐五品以上的文武官员中,仅突厥族就达一百多人^[6]。《资治通鉴》记载,唐太宗甚至公开表示,对于夷狄,“独爱之如一”,并认为这是他获得成功的原因之一。正是如此宽松的政治环境,大大推动了汉唐时期各民族的交融,进而促进了当时文化的繁荣和发展。由于汉唐时期陆海交通的发达,当时中外之间的交往、交流十分频繁。在此过程中,既有汉唐文化的输出,也有国外文化的输入。古老的中华文化注入外来文化的新鲜血液,促进其在新的起点上发展、繁荣。记得当年陈寅恪在论述李唐一族之所以崛起的原因时,曾阐发过这样一段精彩的话:“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7]。同样的道理,由于民族的交融,中外的交往、交流,遂使汉唐文化新机重启扩大恢张,出现了前所

未有的繁盛景象。

3 汉唐时期个体小农的强大

中国封建社会里,个体小农是最基本的经济细胞,其强弱变化决定着社会经济实力的消长。汉唐时期,个体小农的力量,相对而言还是较为强大的。据当今研究农民史的专家推算,汉代农民人均占地67亩(合今46.8亩),平常年景,口粮约占农田产量的 $\frac{3}{5}$,余粮达到 $\frac{2}{5}$,至丰年,其余粮率就会更高^[8]。唐均田令规定,丁男、中男各受永业田20亩,口分田80亩,其农民的土地占有量高于汉代;即使是狭乡,口分田减半给授,其土地占有量也大体与汉代持平。这与明清时期农民占地普遍在10亩以下的情况相比,简直有如天壤。另外,汉唐时期又恰值气候中时段周期内的温暖期,有着一个适宜于农业生产的良好环境。由于汉唐农民占地规模较大,加之良好的自然条件所带来的资源和机遇,当时个体小农的生存空间要广阔得多。具体而言,就是说他们拥有较多的余粮。而农民手里有了粮食,也就意味着他们经济实力的强大。汉唐个体小农的基本状况,决定了汉唐社会具有一个十分雄厚的经济基础;而这正是文化发展、繁荣的必备前提。

4 汉唐时期杰出人物迭出

虽然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但从来也不否认杰出人物对历史发展所起的巨大推动作用。汉唐两代,杰出人物辈出,特别是居最高统治地位的“明君”和居宰执地位的“贤臣”比较多。这里,不妨以西汉为例来看看具体的情况。西汉王朝共12位国君(含吕后),自高祖至宣帝,连续8代帝王基本上都可算是明君。其明君数量之多,当政时间之长,在历史上均属罕见。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西汉共有45人担任过丞相(大司徒),其中50%以上史传所载事略都颇有政绩,可称作贤臣。其贤臣比例之高,也是少见的。唐代的情况与西汉颇相类似。高祖、太宗、高宗、武则天、玄宗等,应该说都属明君之列。即使是安史之乱以后,唐国势日渐衰微之时,也曾出现号称“中兴”的宪宗以及颇有做为的武宗。唐实行多相制,宰相数量极多,其中虽不乏平庸乃至奸佞之辈,但贤相、名相还是占有相当的比例。像房玄龄、杜如晦、马周、姚崇、宋璟等,是其代表性人物。前三位对于著名的贞观之治做出了巨大贡献,后两位则是开元盛世的柱石之臣。唐后期亦出现一代中兴名相裴度。上述这种明君贤臣的领导格局,使汉唐两代的政治相对较为清明,文化政策相对较为宽松,不封闭,不闭塞,从而给当时

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比较大的空间,促其能出现一种大繁荣、大昌盛的局面。汉唐时期,除了皇帝、宰执层次较多杰出人物外,其他方面的杰出人物亦为数不少,且普遍具有强烈的“事功”意识和远大的“天下”眼光。翻开两汉史册,诸如“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则五鼎烹”^[9]、“大丈夫当雄飞,安能雌伏”^[11]、“大丈夫居世,生当封侯,死当庙食”^[11]一类的话语,几乎随处可见。十五岁的陈蕃,尝闲处一室而庭宇芜秽,有人问他:“孺子何不洒扫以待宾客?”陈回答说:“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室乎?”^[11]唐人则将这些更具体化为一种积极入世的参与精神。不少人怀纵横之志,以将相自许;一些人则以济世安民为己任,日为苍生忧,忘己爱苍生。特别当国家危难之际,这种积极入世的参与精神每每又同爱国主义献身精神相结合,呈现出舍身报国的威武雄壮场面。唐人的不少诗句都十分典型地反映了这种情形,如李白“安得倚长剑,跨海斩长鲸”,“过言誓流水,志在清中原”;杜甫“奇兵不在众,万马救中原”;刘长卿“报恩看铁剑,衔命出金闺”,“赴敌甘负戈,论兵勇投笔”;李贺“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等等。这样一批杰出人物的行为和精神风貌,不仅对于汉唐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其本身也成为发达的汉唐文化的组成部分。这里,还需要指出的一点是,汉唐两代均有着与时代相适应的相对较为合理的人才选拔制度,非常有利于杰出人物的脱颖而出。如汉之察举,唐之科举;而且均处在开始阶段,积弊不深,确乎能够选出优秀人才。

(三) 汉唐文化对后世的影响

至于汉唐文化对于后世的影响,无疑是多方面的。现就其主要之点,分述如次:

第一,在政治方面,汉唐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对于其后的各代王朝有着重大的影响。具体来说,即汉代的三公九卿制和郡县制,为汉以后的三国、两晋、南北朝各代所沿用,历时500多年;唐代的三省六部制和郡县制,为唐以后的五代十国、两宋(含与之并存的辽、西夏、金)、元、明、清各王朝所沿用,历时1000多年。当然,这里所说的“沿用”,只是指在大框架下的基本沿用,并非绝对没有丝毫的变革。

第二,在思想方面,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便成为历代的所谓正统思想,其影响之深远是显而易见的。唐代考订经文,颁布官定的五经课本,还刊立石经,“永代作则”^[10],体现了统一儒经的时代特色。另,又颁行《五经正义》,令应科举考试的士子据此答题,不许自由发挥,明显具有

统一思想的功效。特别是当时的一些思想家吸收佛教思想中有利于封建统治的因素,形成新的儒学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这种新思想,经过宋代周敦颐、二程、朱熹等人的继承,逐步发展为理学理论体系,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占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

第三,在文学、史学方面,汉唐的影响同样是非常之大的。众所周知,无论是汉赋,还是唐诗,都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瑰宝,深刻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文学创作活动。唐代的古文运动,反对魏晋南北朝以来的骈俪文,主张恢复先秦两汉的古文传统,在文坛的影响同样深远。它与宋代的古文运动前后相接,奠定了以古文为散文之主体的基础,“从此以后,几有千年,无复有人敢向古文问鼎之轻重”^[11]。再有传奇小说、变文等,对后世俗文学的发展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前文在论述汉唐史学成就时,已大体勾勒出其对于后世的影响。总的来说,汉代是纪传体史书的开创时期。由司马迁首创、班固进而完善的纪传体史书,成为历代王朝修史的准绳,其影响不可谓不大。唐代则是官修正史的开始。从此,新王朝为旧王朝官修正史并由宰相监修成为定制,直到中华民国北洋政府设清史馆、修成《清史稿》,此制才被废弃。

第四,汉唐在文化建设方面对后世的影响也极为明显。例如文字,不论是甲骨文,还是篆书,都难写难认,使用起来很不方便。战国后期,开始出现了简易的隶书,不过当时其受篆书的影响还比较大,因此被称之为篆隶。隶书完全摆脱篆书的影响,成为真正通俗的文字,是在汉代。这为以后通用的汉字奠定了基础。其后的魏晋南北朝,由于政治分裂,战乱频仍,加之汉字正处在由隶书到楷书的交替阶段,故造成汉字使用上的混乱局面。唐统一后,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迫切需要整理异体,辨别俗伪,统一经典用字。于是,在唐太宗的倡导下,以统一楷书字体为目的之字样学应运而生。开此学先河的著作是颜师古的《字样》,可惜久已佚失。流传至今的最重要著作则是颜元孙的《干禄字书》。此著不仅对唐代的汉字规范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对后世的汉字发展也产生了积极影响。有学者评价认为:“此书当与《仓》《雅》并重”^[12]。再如学校,汉代的太学,不仅是中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正式大学,而且也是世界教育史上有确切文字记载的由统一的中央政府设立的第一所官立大学^[13],其影响之深远,自不待言。唐代学校类别之多,教育制度之完备和教育思想之丰富,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均创新高。

这些对后世教育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当时的科技教育,无论是形式、方法和内容,都远远超过了欧洲。尤其是发达的留学生教育,为传播中国文化和加强与各国的友好往来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对留学生所在国的历史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他像图书搜集整理、类书编纂、采风等等,汉唐也各有贡献,并影响后世。

第五,造纸术、雕版印刷术和火药,对后世的影响尤为巨大和深远。众所周知,纸张发明之前,我们的老祖宗曾先后使用过甲骨、竹简、木牍、绢帛等作为书写工具。这些用品要么笨重难寻,要么价值昂贵,均非书写的理想之物。纸的出现,显然是书写工具的一次革命性变化。轻巧便宜的纸张,更加有利于文化的发展和传播。公元8世纪,造纸术传入阿拉伯,12世纪传入欧洲,从而对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雕版印刷较之手工抄写,同样具有革命意义的变化。它使书籍得以批量生产,极大地提高了准确性和传播速度,并空前扩大了传播的规模,对文化事业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雕版印刷又开启了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对印刷业自身的发展也具有重要影响。唐代的火药尽管只是原初性的,但其意义不可低估。特别是对世界文明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更不可低估。从一定的意义上讲,它改变了世界的面貌。总之,汉唐时期出现的造纸术、印刷术和火药,不仅对中国社会文化文明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而且极其深刻地影响着世界的文明进程。

三、汉唐文化与外部世界的交流

交往交流是人类进入文明门槛之后直到现在,而且还将继续发展的最基本的实践活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讲:“某一地方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由此可见交往交流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性。具体到汉唐两代的文化发展,正如前文曾经指出的那样,汉唐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是造成当时文化繁荣发达的主要原因之一。有鉴于此,当我们讨论完上述诸多问题之后,还需要再就汉唐帝国的对外交往交流问题,做一番专门的论述。

历史上,我们的祖先同外部世界的交往交流起始甚早。汉唐时期,这种交往交流更为频繁,规模更加扩大,内涵也更加丰富。

(一)汉唐与中亚、西亚以及非洲等地的文化交流

今中国新疆地区各族人民很早就和中亚各国人民有着密切的友好往来。汉张骞“凿空”西域,使中原地区和中亚、西亚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张骞曾经到达大宛(费尔干纳盆地锡尔河上游东面)、大月氏(阿姆河中部,主要地区在今阿富汗境内)、康居(锡尔河下游及其以北地区)等国。张骞的副使还到达过大夏(阿富汗)、安息(伊朗)等国。以后汉武帝的使者又到达奄蔡(黑河以北)、条支(叙利亚)、犁靬(或认为是条支港口庇特拉,或认为是埃及的亚历山大,但均属罗马帝国范围)等国。中亚、西亚等国也派遣使者东来访问和通商。

为适应中西交通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需要,西汉帝国在西边设立亭障,便利各国使节和商旅交通往来。《史记·大宛列传》载:“西至盐水,往往有亭;而仑头有田卒数百人,因置使者护田积粟,以给使外国者。”当时,西汉和葱岭以西各国之间的使节与商旅来往络绎不绝。汉廷对来客给以隆重的招待,“设酒池肉林,以飨四方之客”^[9],有时皇帝出巡,还让来客随从去各地游历。随着外交、商贸活动的展开,中国的丝织品、冶铁技术、铁器、井渠法、穿井术等传入西方,而中亚、西亚的特产如毛布、毛毡、汗血马以及大夏的石榴,大宛的葡萄、苜蓿、芝麻,安息的胡桃等也相继传入中国,所谓“殊方异物,四面而至”^[9]。此外,中亚的箜篌、琵琶、胡笳、胡角、胡笛等乐器和乐曲、舞蹈也传入中国,使中国古典的音乐、歌舞面目为之一新。另外还有犁靬人的幻术(眩人)也在此期间传入中国,丰富了时人的文化生活。

西汉时通过今新疆的中西陆路交通线主要有南北两条大道:南路从长安出发,经敦煌、鄯善(今新疆罗布泊尔南石头镇)、于阗(今新疆和田)、莎车等地,越葱岭(帕米尔)到大月氏、安息等国;北路经敦煌、车师前王庭(高昌,今吐鲁番附近)、龟兹(库车)、疏勒(喀什噶尔)等地,越葱岭到大宛、康居、奄蔡,由奄蔡南下可达安息,由安息向西可达大秦(罗马帝国)。由于通过这两条路输出的商品主要是丝织品,故被称为“丝绸之路”,它是当时中西交往交流的大动脉。东汉时,西域都护定远侯班超于永元九年(97)派甘英出使大秦,一直到达条支海(波斯湾)。这次出使虽然没有直接开辟与大秦的通道,但反映了东汉政府要与欧洲建立交往关系的愿望。延熹九年(166),大秦商人来到中国,以大秦王安敦

的名义,赠送给桓帝礼物。此后,汉与大秦的交往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

唐时,在中亚的锡尔河以南至阿姆河一带,有称为“昭武九姓国”的康、安、石、曹、米、何、史、火寻、戊地九国。相传九国的祖先是月氏人,原住在祁连山北昭武城(今甘肃高台境内),为匈奴所迫,迁居此地。这些国家善商贾,很早就和中国通商。西突厥强盛时,他们被征服;唐平西突厥后,他们名义上内附,实际上仍相对独立。唐太宗曾对安国使臣说:“西突厥已降,商旅可行矣”^[14],昭武诸国都为此而高兴。当时在中国的外商以这些国家的为最多。20世纪后半期,在西安、洛阳出土了许多昭武九姓中曹、石、米、何、康、安诸姓的墓志,他们有的为唐王朝立了军功,有的担任过唐的军政职务。石国、康国的胡腾舞、胡旋舞和柘枝舞,也传入长安,为唐人所喜爱。双方的交往交流相当密切。在中亚还有吐火罗国,即今之阿富汗。其地处东西方陆路交通的要冲,自汉以来就和中国有密切关系。唐初,吐火罗多次派使臣前来通好,唐高宗亦曾派王名远访问吐火罗。唐玄宗时,双方交往更为频繁。开元十二年(724),吐火罗使臣一次就给唐带来乾婆多罗等药物200余种。此前,吐火罗送给唐的礼物还有汗血马、玻璃、玛瑙、金精等。

与唐同时代的西亚重要国家波斯(伊朗),其萨珊王朝,由北魏到隋唐与中国的关系都很密切。7世纪中,波斯为大食(阿拉伯)所灭,波斯王卑路斯及其子泥涅斯先后定居长安,后皆客死于唐。波斯虽亡,但其西部部众犹存,仍与唐保持着密切关系,多次来唐通好。当时有许多波斯人流亡到中国落户,波斯商人的足迹遍及唐境内各地。在长安、洛阳、扬州、广州等城市中开设的波斯胡店,以经营宝石、珊瑚、玛瑙、香料、药品而驰名。晚唐著名花间派词人李珣,就是留居在四川的波斯商人后裔,他编著的《海药本草》中介绍了不少波斯药材。在吐鲁番、西宁、西安、太原以及广东英德都曾发现过波斯萨珊王朝的银币,有的数量还很多,这雄辩地证明唐与波斯之间的商贸交往空前繁荣。随着商贸发展,双方的文化交流势所必然。波斯输入唐朝的特产主要有菠菜、波斯枣等,而唐的丝绸、瓷器、纸张等也远销波斯,并进而转输西方。在伊朗境内曾发现不少唐三彩,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的唐联珠对鸟、猪头等纹锦,图案风格与波斯萨珊王朝的相似,织法上也明显受波斯影响。这些都是双方文化交流的历史遗存。

与唐同时代的西亚重要国家还有拂菻(东罗

马)。贞观十七年(643),拂菻王波多力遣使来唐,献赤玻璃、石绿、金精等物。唐太宗回书答礼,并回赠绫、绮等丝织品。在唐前期,拂菻来使凡七次。东罗马的皇帝、贵族、妇女都格外喜欢中国的丝织品,所以“常利得中国缣素,解以为胡绫、绀绫,数与安息(波斯)诸胡交市于海中”^[15]。

由上可见,拂菻是唐丝织物的重要转输地。东罗马的医术和吞刀吐火等杂技也传入唐朝。在西安、咸阳曾发现东罗马的金币,可能是拂菻商人带来的。由于东罗马地跨亚、非、欧三洲,因此唐同它的交往交流,也就不能不突破西亚的范围,而涉及非洲与欧洲。

大食(阿拉伯)是一个地跨亚、非的帝国。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用《古兰经》鼓励他的门徒:“为了追求知识,虽远在中国,也应该去。”反映了当时阿拉伯人对中国文明的向往。永徽二年(651),大食遣使与唐通好,在此后的148年间,大食遣使来唐共有36次之多。当时,阿拉伯商人到中国的也很多,长安、洛阳、扬州、广州、泉州等地都有他们的足迹,不少人在中国定居落户,有的还入仕于唐,大食商人后裔李彦升在长安考中了进士,堪称双方友好关系史上的一段佳话。天宝十年(751),大食在怛罗斯战役中击败唐将高仙芝,所俘获的唐兵中有造纸工人,遂利用他们设厂造纸,于是中国的造纸术传到了中亚的撒马尔罕,复又传到西亚的大马士革,最后西传到非洲和欧洲,为西方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大食所俘虏的唐军中有一个叫杜环的人,是著名史学家杜佑的族侄。他在大食住了10年,并曾随同阿拉伯使团去过非洲许多地方,是唐时有名可指的到达非洲的第一人。杜环归国后,著成《经行记》一书,其中介绍大食都城亚俱罗盛况时说,市中有“绫绢机杼、金银匠、画匠,汉匠起作画者,京兆人樊淑、刘泚,织络者,河东人乐隈、吕礼”^[15]。可见除造纸术以外,唐朝的其他手工业技术也传到了阿拉伯。该书还记述了作者本人从耶路撒冷启程,经埃及、努比亚到埃塞俄比亚的阿克苏姆王国的见闻及沿途风土人情,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近代考古工作者曾在伊拉克底格里斯河西岸的沙马拉城遗址发掘出大批中国陶瓷,其中有唐三彩、白瓷和青瓷;在北非的福斯特(即开罗古城)遗址中,曾发掘出唐的青瓷器。这些来自遥远东方的中国产品,正是唐朝与阿拉伯及非洲文化经济交流的历史见证。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由于唐与西亚以西地区

的交往主要是通过大食与波斯商人进行的,所以更多地受到他们的影响。例如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把索马里以南至莫桑比克的东非沿海地区及岛屿称为“桑给巴尔”(Zanzibar),唐人遂依波斯语的Zang,称为“僧祇”。这一译名,在唐懿宗咸通年间樊绰撰《蛮书》时已相当通行了。另外,大食商人曾把东非奴隶输入唐,唐人则称之为“僧祇奴”,亦曰“昆仑奴”。唐代传奇中,这些黑奴的艺术形象以侠胆义肠感人至深,表现出社会对他们所蒙受苦难的同情。1954年西安南郊唐墓曾出土一件黑人陶俑,生动地表现了“僧祇奴”坚强健壮的形象。这反映唐与非洲的交往交流,已经扩及到人口的买卖。

唐通往中亚、西亚以至西方的陆路交通以京师长安为中心,基本仍沿着汉代丝绸之路的通道,同时又有一条北路,即经今蒙古地区到叶尼塞河、鄂毕河上游,往西通额尔齐斯河以西地区。尤其令人瞩目的是当时的海上交通。唐德宗时宰相贾耽所撰《皇华四达记》,准确详细地记载了中国至波斯湾及其以西的航路。其中说到的距波斯湾内乌拉国(今奥波拉)48日航程的所谓“三兰国”,或认为在东非沿岸的桑给巴尔附近^[16],或据此认为,“富有冒险精神、善于战风斗浪的中国海员早在唐代就驾驶商船,从波斯湾沿着阿拉伯半岛南岸驶往东非海滨了”^[17]。上述的海上航线,亦见于阿伯人的记载之中。9世纪到过印度和中国的阿拉伯商人苏莱曼,在其所撰《印度·中国游记》里便谈及中国至北非的海道航程:中国货船先抵波斯湾口的西拉甫,然后换船经红海到达埃及。他还描写了广州阿拉伯人的居住情况、中国的瓷器和茶叶以及行政措施。据载,当时广州有伊斯兰教判官一人,依本教风俗管理本族人民,举行宗教仪式。这说明,随着阿拉伯人的来华,伊斯兰教也相继传入中国。

(二)汉唐与东北亚的文化交流

由于地缘关系,东北亚国家(主要是朝鲜和日本)与中国的交往交流甚为密切;而汉唐两代的交往交流,更堪称历史上的典型时期。

朝鲜和中国历来就是唇齿相依的友好邻邦。早在公元前1000多年前,两国人民之间在经济上、文化上就有了频繁的交往。战国时邻近朝鲜的燕、齐两地人民,为反抗统治者的压迫,曾成批迁徙到朝鲜,带去了不少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西汉初,燕人卫满乘乱率千余人,渡坝水(鸭绿江),奔朝鲜,后被立为朝鲜王,建都王险城(平壤),统治朝鲜半岛的西北部。汉惠、吕后时,辽东太守“约满为外

臣”^[12]。元朔二年(前128),汉武帝接受涉君南闾率28万口内附,以其地为苍海郡。元封二年(前109),汉与卫氏朝鲜发生战争,后平定之,以其地置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近数十年来,在原乐浪郡旧地,取得比较集中的考古收获。除了多处古城址有丰富的遗存发现外,墓葬群更受到学界的瞩目。其中以乐浪郡治所南面的墓葬群最为著名,总数达2000余座。这些古墓多为方形封土的坟丘,形制与中国周秦汉时代最为通行的墓葬形制类同,经正式发掘的有50余座。墓葬结构主要以木椁墓和砖室墓两种为主,分别代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墓室结构、棺椁形制、随葬品组合、文字内容、画像构图以及其他文化遗存的风格,都与中原地区同时期的发现一致。可见,当时汉文化对朝鲜半岛曾经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东汉末,朝鲜北部先后兴起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在南部则有三韩:西边的马韩、东边的辰韩、南边的弁韩。三韩中以马韩最大,有五十几个部落,辰韩、弁韩各12个部落,各部落总合有50多万户。马韩的月支部酋长称辰王,名义上是三韩的大酋长。其人民已掌握种田养蚕织布技术,住的是草屋土室,与汉人接触较多,受汉文化影响较大。辰韩又称秦韩,相传秦朝人逃避苦役,逃亡到朝鲜半岛东南部,与当地土著居民融合在一起,经济、文化水平较高,人民能种五谷、养蚕织布,能冶造铁器。弁韩最小,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三韩的发展水平虽略有不同,但总的来看都处在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阶段。三韩在东汉王朝的影响下,模仿汉的经济方式和政治制度,由此社会发生了飞跃性变化。

唐初,朝鲜半岛上仍然是高句丽、百济和新罗鼎立的局面,三国均与唐有着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唐高祖曾经遣使赴高句丽,携有天尊像,随行道士,为讲《老子》书,高句丽王及道俗听者数千人。高句丽王也曾遣使于唐,再求道教。唐太宗亦遣道士赴高句丽,兼赐老子《道德经》。集中在集安、平壤、安岳等地的高句丽壁画墓,充分体现了高句丽艺术与中国艺术的完美结合。其神灵题材的画面多取材于中原神话故事,其表现手法也具有中原风格。百济墓葬出土的器物多来自中国,壁画四神图也取材于中原神话。早在南朝时,百济教育已经以中国经史为主要内容。7世纪中叶,百济曾派贵族子弟赴唐,入国学,直接学习汉文化典籍。公元675年,新罗统一了朝鲜半岛,从此朝鲜与唐的交往交流进入一个新阶段。那时,新罗商人来唐贸易的很多,北起登州、莱州(今山东掖县),南到楚州、扬州都有他们的

足迹。楚州设有新罗馆,山东半岛的赤山、莱州等地设有新罗坊,坊中置总管、翻译,为新罗人集中侨居的地方。当时来往于中国和朝鲜、日本的船只常常多达数十艘。新罗商人给唐送来了土特产,从唐贩回丝绸、瓷器、茶叶、书籍等物品。新罗派大批留学生到长安学习。在唐的外国留学生,以新罗人为最多。开成五年(840),学成归国的新罗留学生一次就达百余人。新罗留学生中有不少人参加过唐的科举考试,有的人进士及第后留在唐做官。如崔致远12岁入唐求学,18岁考取进士,曾任溧水县尉、侍御史、内供奉等职,并著有《桂苑笔耕集》20卷、《四六集》1卷。新罗留学生在吸收和传播唐文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唐文化对新罗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也是巨大的。675年,新罗开始采用唐的历法。639~749年,新罗相继设立了医学、天文和漏刻博士,专事研究唐的医学、天文和历法。8世纪中叶,新罗仿效唐的政治制度改革其行政组织,中央设执事省,相当于唐的尚书省,地方行政机构包括州、郡、县、乡,也与唐相似。788年,新罗亦采用科举制来选拔官吏,以《左传》、《礼记》、《孝经》为主要考试科目。中国的典籍如诸子书、《文选》、《晋书》、诗文等大量传入新罗,白居易的诗歌尤受欢迎。7世纪末,新罗学者薛聪创造了“吏读”法,用汉字作为音符来标记朝语的助词、助动词等,帮助阅读汉文,对文化的普及起了推动作用。828年,新罗来唐的使臣把茶种带回国,从此朝鲜开始种茶。唐末以后,雕版印刷术也传到了朝鲜。737年新罗王逝世时,唐玄宗特地挑选经学家邢昺前往吊祭,并讲道:“新罗号为君子之国,颇知书记,有类中华;以卿学术,善与讲论,故选使充此”^[14]。由此可见,在唐影响下的新罗文化是相当发达的。当然,在长期的友好交往中,朝鲜文化对唐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例如高丽乐便颇受唐人的欢迎。在唐都长安居住着不少朝鲜音乐家,他们对中朝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一些新罗学者在佛法研究和诗词创作方面深有造诣,他们的文化艺术创造,丰富了唐文化的内涵。在唐的进口物产中,新罗货物数量居首位,有牛黄、人参、海豹皮、马、朝霞绉、金、银等。这些也都丰富了唐人的社会生活。

中国古代将日本泛称为“倭”,古老的《山海经》中就已有所记载。秦代徐福东渡的传说,反映了日本文化在绳文时代末期至弥生时代初期,因中国移民带去的先进文明而发生空前飞跃的史实。汉代,中日两国的交往交流进一步发展。汉武帝时,日本

有 30 余国派遣使者赴汉,是为两国使节往来的最早记录。东汉初,倭人分为 100 多个小国。建武中元二年(57),倭奴国遣使与汉通好,光武帝刘秀遂以“汉倭奴国王”金印相赠。这段史实,见于范晔《后汉书·东夷传》。1784 年,在日本福冈市志贺岛崎村出土了这颗金印,证实了范晔书记载的真实性。这成为中日古代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一般认为,倭奴国地望,在今北九州博多附近的雫县一带。

唐和日本的交往交流达到空前繁荣的时期,当时日本正处在封建制度确立和巩固阶段,对唐的昌盛极为赞赏,故努力向唐学习,不断派遣使者、留学生、学问僧赴唐,数量之多仅次于新罗。唐通日本的道路有 3 条:一是由登州(今山东蓬莱)出发,渡渤海沿辽东半岛东岸和朝鲜半岛西岸到日本;二是由楚州(今江苏淮安)出淮河口,沿山东半岛北上,东渡黄海经朝鲜半岛到日本;三是由扬州或明州出海,横渡东海直驶日本。

贞观五年(631),日本派出由留学生和学问僧组成的第一次“遣唐使”。此后 207 年间,日方派出遣唐使共 12 次,另外还有赴唐的“迎入唐使”和“送客唐使”共 4 次。从人数来看,早期遣唐使团一般不超过 200 人,自 8 世纪初起,人数倍增,开元五年(717)、开元二十一年(733)、开成三年(838)所派使团,人数均在 550 人以上。遣唐使团组织完备,设有大使、副使、判官、录事,成员有翻译、医师、阴阳师、画师、史生、射手、船师、音乐长、音声生、玉生、锻生、铸生、细工生、船匠、舵师、水手长、水手等,还有留学生、学问僧多人。遣唐大使、副使都挑选了解唐朝情况和博通经史、娴习文艺的人担任,其正职官级一般在从四品上下。遣唐使赠送唐的礼物,多为珍珠绢、琥珀、玛瑙、水织纈等贵重物品。1970 年在西安发现的日本“和铜开珎”银币,很可能就是遣唐使带来的。唐也回赠一些高级丝织品、瓷器、乐器、文化典籍等。日本奈良东大寺内正仓院所存放的唐代乐器、屏风、铜镜、大刀等珍贵文物,就有一部分是遣唐使带回去的。

日本留学生来唐后,一般都在长安国子监学习各种专门知识。现藏西北大学博物馆的日本留学生并真成墓志,生动反映了这段历史的真实。他们与中国诗人、学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如阿倍仲麻吕(汉名晁衡),长期留居中国,擅长诗文,在唐历任光禄大夫、御史中丞、秘书监等职。他与著名诗人李白、王维等人友情极深,常作诗相酬赠。天宝十二年(753),晁衡在回国途中遭遇风险,船只漂流到越

南,误传被淹死,李白为此写了《哭晁卿衡的悼诗:“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充分表达了当时两国人民的深情厚谊。后来晁衡历尽艰险,复返长安,继续在唐任职,直到大历五年(770)病逝,享年 73 岁。今西安兴庆公园内特为之树碑,以纪念这位中日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尽管晁衡是一个很特殊的例子,但日本留学生回国以后对文化传播所起的作用,是十分显著的,在中日文化交流的史册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

日本来华学习的学问僧 90 余人,其中最著名的是空海。他于贞元二十年(804)年来中国,在长安青龙寺跟名僧惠果学密宗,归国时带回 180 多部佛经,并在日本建立了密宗。他除研究佛经外,还广泛吸收中国文化。他不仅是书法家,而且编写了《文镜秘府论》和《篆隶万象名义》二书,对中国的文学和文字有深入研究,在中日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此间,中国僧人也不断东渡日本,沟通中日两国的文化,其中贡献最大的要数鉴真和尚。鉴真,姓淳于,扬州人,生于垂拱四年(688),对于律宗有很深的研究,在扬州大明寺讲律传戒。他应日本圣武天皇的约请东渡日本,经过六次努力,历尽艰险,频经炎热,双目失明,终于在天宝十三年(754)携同弟子抵日,时已年近七旬。鉴真把律宗传到日本,同时还把佛寺建筑、雕塑、绘画等艺术传授给他们。日本现存的唐招提寺,为鉴真及其弟子创建,它对日本建筑艺术有重要影响。该寺至今还收藏着鉴真的坐像,这是唐代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纪念物。鉴真又精通医学,尤精本草,他虽失明,但能以鼻嗅分辨出各种药物,对日本医药学发展亦做出了贡献。

通过遣唐使、留学生、学问僧和中国僧人等的交往,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在唐时发展到一个空前广泛而深入的阶段。日本 9 世纪末编写的《日本见在书目录》,记载当时日本所存的汉文书有 1 579 部,16 000 多卷,包括文学、哲学、史学、艺术、科技等各方面的典籍。这些汉籍大部分是遣唐使、留学生、学问僧、中国僧人、商人等带到日本的。在如此空前规模的文化交流之下,唐文化极其深刻地影响了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

政治方面,贞观十九年(645),日本进行大化革新,在中国长期留学的高向玄理和僧旻被任命为国博士,参议国家大事。他们参照隋唐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施行班田收受法和租庸调制;参照隋唐官制,改革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制;参照隋唐律令,制

订了《大宝律令》。

教育方面,天智天皇时期在京都设立大学,以后学制逐渐完备,学科分为明经、纪传、明法、书、算等科。在典药寮分别设医、针、按摩等科。阴阳寮设阴阳、历法、天文等科。各科学习的内容基本上与唐制相仿。

语言文字方面,8世纪以前,日本使用汉字作为表达记述的工具,留学生吉备真备和学问僧空海在日本人民利用中国汉字的标音记意的基础上,创造了日文假名字母:前者采用汉字楷体偏旁造成“片假名”,后者采用汉字草体造成“平假名”。这些新体文字的发明,大大推动了日本文化的发展。同时,日文的词汇和文法也受到汉语的影响。

文学方面,唐代丰富多彩的文学,深受日本人民的欢迎。唐著名作家的诗文集相继传入日本,形象鲜明、语言通俗的白居易诗尤为日本人士所喜爱。平安时代的诗集《和汉朗咏集》收录了589首诗,其中白居易诗就有137首。白氏的长诗《长恨歌》和《琵琶行》流传更广,甚至编成戏曲演唱。日本人擅长汉诗,汉文者可谓人才辈出,留学生晁衡、吉备真备、小野篁、橘逸势等人对中国诗文都有很深的造诣。用汉字写成的文学著作在日本不断出现,著名的有《怀风藻》、《凌云集》、《经国集》等。仅《经国集》所收汉文诗便有917首。

艺术方面,唐的音乐、绘画、雕塑、书法、工艺美术等纷纷传入日本。日本吸取、借鉴唐的乐制,宫廷请唐乐师教授音乐,并派留学生来华学习唐乐,唐的不少乐书、乐器也陆续传入日本。唐的绘画亦深为日本人所喜爱,唐人绘画经日本画家摹绘者,称为“唐绘”。1971~1972年出土的唐章怀太子墓和懿德太子墓的侍女壁画,与1972年日本高松塚古墓中发现的同时代侍女群壁画十分相似。这提供了一个日本受唐绘画影响的具体范例。

科学技术方面,唐朝先进的生产技术、天文、历法、医学、数学、建筑、雕版印刷等陆续传入日本。中国式的犁,名为唐耨的大型锄等农具,传入日本后很快得以普遍使用。日本仿照唐的水车,制造了手推、牛拉、脚踏等不同类型的水车。在日本的典籍里还保留唐锹、唐竿、唐箕、唐碓、唐臼等器物名称。唐的《大衍历》、《宣明历》也被日本所采用。中国著名的医学著作《素问》、《难经》、《脉经》、《甲乙经》、《黄帝内经》、《张仲景方》、《神农本草》和隋唐时期的医学巨著《诸病源候论》、《千金方》、《唐新本草》等书先后传入日本,日本人结合自己的医疗实践经验,创

建了“汉方医学”。至今还保留完整的平安时代日本医学家所写的医学专著《医心方》等书,受唐医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7世纪以前,日本没有固定的都城,延载元年(694)兴建了第一个都城藤原京,景云元年(710)建平城京,贞元十年(794)又建平安京。这些城市的设计、布局皆模仿唐长安城,建筑所用砖瓦的纹饰也与唐略同。

生活习惯方面,唐人打马球、角抵、围棋等体育活动,亦先后传入日本。茶叶于奈良时期传入日本,开始当药用,到平安时期已兴起喝茶之风。唐服传入日本,亦为民众所喜爱。在节令风俗上,端午饮菖蒲酒,七月十五日盂兰盆会,九月九日重阳,也由唐传入日本。中日文化交流之密切,可以说已达到无孔不入的地步。

(三)汉唐与南亚、东南亚之间的文化交流

南亚的印度在中国的古书上称为“身毒”或“天竺”。早在公元前2世纪,中国和印度就有经济往来。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在大夏曾看到中国的邛竹杖和蜀布,经询问得知是从身毒国贩运去的。后来,张骞的副使也到过身毒和罽宾(克什米尔)。西汉晚期,印度的佛教通过西域传入中国内地,这是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此后,汉帝国与印度的联系日趋密切。汉明帝曾派蔡愔去印度取经,继而印度僧侣大量来华,译佛经,传佛学,对中国思想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唐初,中天竺王尸罗逸多(戒日王)征服了天竺五部,不时遣使与唐通好。唐太宗也一再派梁怀璠等出使报聘。其中王玄策曾三次出使,均不辱使命,大大宣扬了唐的国威,对中国与南亚各国的国际交往与文化交流、宗教交流,建立了特殊的功勋。当时中印的贸易往来频繁,孟加拉、印度半岛东西两岸,经常有中国商船泊港,印度的商船也常到广州、泉州来做生意。唐输往印度的商品主要有麝香、苧丝、色绢、瓷器、铜钱等,从印度输入的主要有宝石、珍珠、棉布、胡椒等。双方频繁的往来必然促进彼此文化的发展。唐太宗曾派人到中天竺的摩揭陀学习熬糖法,从而提高了中国的制糖技术。由于佛经的翻译,中国产生了与佛教有密切联系的变文。中国的敦煌、云冈、麦积山以及洛阳龙门石窟的壁画和雕塑,都保留着印度北部健陀罗艺术风格的影响。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天文、历法、医学、音韵学、音乐、舞蹈、绘画、建筑等也陆续传入,对中国有较大的影响。在7世纪末,中国的纸张经中亚传到印度,以后又经尼泊

尔传去了造纸术,从此印度结束了用白桦树皮和贝叶写字的时代。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两国的佛教徒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中,最著名的是中国的高僧玄奘和义净。

玄奘姓陈,河南缙氏(今河南偃师南)人。贞观元年(627),他从长安启程去天竺游学,途经今新疆及中亚各国,饱经风霜,历尽艰险。客居印度期间,玄奘主要在当时的佛教学术中心那烂陀寺(印度伽雅城西北),从戒贤学习《瑜伽师地论》、《大乘起信论》,并代戒贤为众僧讲经说法,主讲过《摄大乘论》,还发表过重要论文《会宗论》。贞观十六年(642),戒日王在曲女城(印度卡诺吉城)举行大型佛教经学辩论会,参加的有印度十八国的国王和各派僧侣六七千人,玄奘做主讲,并把所著《破恶见论》按印度习惯挂在会场门口,征求答辩,深为印度各界所佩服,获得了很高的荣誉。贞观十九年(645),玄奘回到长安,带回了梵文佛经657部。此后他在慈恩寺专心译经,20年间共译佛经75部,1335卷。这些佛经后来在印度大部分失传,中文译本就成了研究古印度的重要文献。当年留学时,玄奘曾把秦王破阵乐介绍到印度。回国后,他又把《道德经》译成梵文,送往印度。玄奘还将这次游学所经历的各国各地区的风土、人情、物产、信仰和历史传说等,撰成《大唐西域记》12卷,成为研究中古时期中亚、印度半岛各国历史、地理和中西交通的宝贵资料。欧洲和日本学者都曾对此书进行过翻译和研究。日后印度那烂陀废墟、王舍城旧址、阿简达石窟,得以显露和再现其光辉,玄奘及其记录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义净是继玄奘之后的另一位佛教大师,于咸亨二年(671)搭乘波斯船从广州浮海赴印度。先在那烂陀寺钻研佛学10年,后到师利佛逝、末罗瑜(在苏门答腊)搜罗并抄写佛经,滞留南洋又10年。先后周游30余国,历时25年,归国时共带回梵文经书400部。后在洛阳译经12年,译成佛经230卷。还先后撰写了《南海寄归内法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二书,主要记述了南亚许多国家的社会、文化和宗教情况,是研究7世纪印度、巴基斯坦及南洋各国史地的宝贵资料。当时,除中国僧人前往印度求法之外,亦有不少印度高僧携佛经来唐朝,有的还参加了译经工作,为中印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

南亚的尼泊尔和斯里兰卡与唐的交往交流也很频繁。尼泊尔在唐时称尼婆罗。唐的地方政权吐蕃与尼婆罗毗邻,双方有着密切的关系,松赞干布曾娶

尼婆罗公主为妻。吐蕃、尼婆罗之间有一条国际通道,称吐蕃尼婆罗道。吐蕃学者常去尼婆罗,尼婆罗著名学者西拉曼鸠也访问过吐蕃。两国在佛教、绘画、建筑等方面,相互都有影响。唐朝时尼泊尔和中国内地的关系也很密切。许多由陆路去印度的唐朝僧人,往往取道这里。玄奘访印,曾于贞观九年(635)到尼泊尔探求佛学,参谒过释迦牟尼的诞生地迦毗罗卫国,并访问了加德满都。贞观二十一年(635),尼婆罗派使臣来唐,带来了波棱(菠菜)、诃提葱和酢菜。唐时中国的造纸术也传入尼泊尔。中国古代称斯里兰卡为狮子国。唐咸亨、天宝初,狮子国两次遣使来唐。在后一次,狮子国使者给唐送来了大珠、钿金、宝瓔、象牙、跌氎等贵重礼物。唐人李肇在所著《国史补》中说,当时来广州的外国船只,以狮子国的为最大,每年来多次。由此可见中国和斯里兰卡之间交往交流的密切。

东南亚各国中,越南很早就同中国有着直接经济文化交往。秦汉之际,赵佗占据岭南地区称王,灭越南北部的瓯骆国。汉武帝灭赵氏政权后,在越南北部设交趾、九真、日南三郡,沿用赵氏统治方式。此间,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不仅十分频繁,而且是以直接的方式进行。汉内地的铁农具与越南的土特产互相交换,丰富了彼此的经济文化生活。东汉初,锡光任交趾太守,任延为九真太守,教越民耕种技术,设立学校,传播先进文化,对改变当地落后状态起了很大促进作用。后来虽然发生了二征起义,但平息之后,东汉政府在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了一些改革,如穿渠灌田,发展农业生产,废除残暴的“越律”十余条等,使越南地区所受汉先进文化的影响更加深刻。唐时,越南南部为林邑国。武德六年(623)和八年(625),林邑王范梵志两次遣使来唐通好。唐高祖李渊曾举行盛宴欢迎林邑使者,演奏了九部乐,并赠锦、彩等丝织品。贞观时,林邑也一再派使者,送来驯象、镳锁、五色带、朝霞布、火珠等物;另外还有五色鸚鹄,太宗曾命李百药为作《鸚鹄赋》。高宗、玄宗时期,林邑仍经常遣使来唐。天宝八年(749),曾送来真珠100串,沉香30斤,驯象20只。至德以后,林邑改称环王国,依然与唐通好。终唐之世的近三百年中,林邑使臣来唐达15次之多。不仅唐的典章制度传播到越南,产生了很大影响,而且越南的佛教也是从唐传入的。唐代诗人如杜审言、刘禹锡、韩偓等都去过越南,与越南诗人唱和赠答,受到欢迎。其时,越南也以诗文取士,擅长诗赋的越南人姜公辅还受到唐德宗的器重,做过唐的翰林学士,

所写《白云照春海赋》被唐人看做难得的佳作。

西汉或更早的时候,缅甸与中国就有往来。当时从今四川经云南可通缅甸,中国的蜀布、邛竹杖即由这条道路运往身毒、大夏等国。同时还有从交州合浦郡徐闻县去缅甸的海上航路。这使两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更加密切。和帝永元六年(94),永昌郡境外的敦忍乙王莫延曾派使者来访,双方互赠礼物。永元九年(97),缅甸北部的掸国王雍由调派遣使臣向汉赠送珍宝;东汉则以金印回赠。安帝永宁元年(120),雍由调再次遣使来汉,“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11]。缅甸的音乐和杂技,在汉朝深受欢迎。史载幻人“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11]。据此可知,缅甸的杂技,当从西方的罗马传入;那时的中西文化交流,应该说已经相当可观了。隋唐时,缅甸称骠国。贞元十八年(802),骠国王雍羌派遣弟悉利移、城主舒难陀率乐工35人,带来骠国乐22曲,到长安演奏。所用乐舞器22种,皆与中国不同。白居易诗《骠国乐》写道:“德宗立仗御紫庭,黄主、黄广不寒为尔听,玉螺一吹椎髻耸,铜鼓一击文身踊。”骠国乐舞受到了唐德宗的重视,轰动了整个长安城。除白居易外,元稹、胡直钧、唐次等也都作诗赞其优美。德宗还写信给骠王,称道两国的友好关系。后来,骠国又多次遣使访唐。

今印尼、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在西汉时已同中国有了交往交流关系。这从《汉书·地理志》所记的南洋航线、航程,便可得到证明。唐时,在苏门答腊立国的有室利佛逝、堕婆登,在爪哇立国的称阇婆。咸亨以后,室利佛逝多次派使臣到唐朝通好,唐在曲江设宴招待,并封其王为右金吾大将军宾义王。堕婆登在贞观末年曾遣使来唐,携带有古贝(棉布)、象牙、白檀等礼物,唐太宗给以回礼,并复信报聘。阇婆自贞观以后不断遣使来唐,仅大历年间就三次派来使者,带来的礼品有带瑇瑁、生犀等。前文所述高僧义净在南洋各国的经历,亦反映了唐朝与东南亚国家文化交流的一个侧面。

在今柬埔寨境内的扶南国,于6世纪后期被其藩属真腊用武力推翻,以吉蔑族为核心的高棉王国诞生。中国古籍上所说的“吉蔑”、“真腊”、“文单”、“婆缕”,即指这个新兴的王朝。武德六年(623),真腊派使者来唐。贞观二年(628),又同林邑一起遣使来唐,太宗回赐了很多礼品。以后,真腊的使者多次携带贵重礼物来唐聘问。永徽元年至六年(650~655),仅珍贵的白象就送来了32头。

它们都经过特殊训练,会跪拜舞蹈,每逢节日常在宫苑中表演。天宝十二年(753),真腊王子访唐,玄宗赠以“果毅都尉”的荣誉称号。后来,真腊副王婆弥和王后又来唐朝访问,代宗极为重视,以国宾礼接待,并特赠以汉名“宾汉”(中国的上宾)作为纪念。当时双方商贸往来频繁。唐巨型帆船,连桅接檣开往真腊。行销于当地的中国货主要有金银、缣帛、漆器、瓷器、水银、纸札、硫磺、焰硝、檀木、白芷、麝香、麻布、雨伞、铁锅、铜盘、水珠、桐油、簸箕、木梳、针等多种,特别是泉州的青瓷器和明州的草席,倍受真腊人的欢迎。真腊商船也不时出现在中国海港,其贸易地区主要在广州。随着双方交往的进一步发展,扶南音乐亦传入中国。唐置有扶南乐,由扶南乐师传授后宫歌女曲艺,在节庆宴享时献演。史载:“扶南乐舞者二人,以朝霞为衣,赤皮鞋”^[15]。古柬埔寨富有民族特色的音乐舞蹈,丰富了中国古典歌舞的内容。

四、汉唐文化繁荣的历史启示

通过以上对汉唐文化历史成就的回顾,对汉唐两代中外文化交流情况的论述,以及关于汉唐文化特点、汉唐文化繁荣发达的主要原因、汉唐文化对后世的影响诸问题的剖析,似可得到如下的几点历史启示。

(一) 统一安定是文化繁荣发达的前提

从大文化的视角来看,中国自秦王朝以后的封建社会里,其文化能否全面发达繁荣,与是否具有统一安定的大环境有着直接的关系。前文之所以说大一统是造成汉唐文化繁荣发达的首要原因,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无可否认,促使文化发展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在分裂的乱世,也会有某种发达的文化,甚或出现繁荣,如魏晋时期思想领域的玄学,南北朝自然科学方面的数学等等。但这毕竟只是文化个别层面的发达和繁荣,而不是文化全面的繁荣发达。从前述汉唐文化的种种辉煌成就、汉唐两朝中外文化交流的空前盛况,人们自然就会把这一切同强大的、统一安定的汉唐帝国联系在一起,并把后者理所当然地视为前者所赖以产生的前提。

(二) 经济发展是文化繁荣发达的基础

如果只有政治上的统一安定,而没有经济上的

发展强大,那么文化的繁荣发达显然也是不可能的。从前文所述汉唐时期个体小农强大的情况可知,当时社会具有一个相当稳定的经济基础。这就使汉唐文化发展有了很足的底气。诚然,社会现象非常复杂,经济与文化之间并不完全是一种简单的线性决定关系。但不管怎么说,正如马克思主义所认为的那样,经济是基础,而经济基础是决定上层建筑的。《史记·管晏列传》记载,管夷吾曾讲:“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斯言良是!

(三)开放交流是文化繁荣发达的根本途径

汉唐帝国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都是最为开放的朝代。这种开放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上:一是在国内对少数民族的开放;二是在国际上对世界各国的开放。正因为汉唐王朝采取了对外开放政策,而不是闭关锁国,所以才有了如前所述的那样宏大的中外文化交流规模。可以这样说,当时世界上文明的主要中心,皆与汉唐建立了交往交流关系。通过相互交流,汉唐帝国既拿来又送去,既吸收又输出,不仅有力促进了自身文化的繁荣发达,而且大大推进了世界文化的发展。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谢弗教授曾对唐代进口物品进行综合研究,写成专著。其书取7世纪时撒马尔罕王国(中国文献称为“康国”)向唐廷进献的一种珍异黄桃(金桃)为名,叫《撒马尔罕的金桃》(中译本改称《唐代的外来文明》)。书中从家畜、野兽、飞禽、毛皮和羽毛、植物、木材、食物、香料、药物、纺织品、颜料、矿石、宝石、金属制品、世俗器物、宗教器物、书籍等方面,对唐代的舶来品做了相当细致的考证。国外研究者向世人所展示的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巨大成就再次雄辩地说明,开放交流乃是文化繁荣发达的根本途径。

(四)贤明式领导是文化繁荣发达的有力保证

所谓“贤明式领导”,即前文在分析汉唐文化繁荣发达原因时所指出的那种明君贤臣式的领导。毫无疑问,这种领导是集权型的。按照国外管理学家有关领导“连续带”所划分的两种集权型领导性态——独裁式集权领导、仁慈式集权领导——来衡量的话,它显然应该属于“仁慈式集权领导”。一般地讲,“仁慈式集权领导”的管理阶层对于部属有一种谦和的态度,尽管部属对主管心存畏惧,但部属可以参与一定的决策活动;“独裁式集权领导”的管理阶层则对部属缺乏信心,决策均由管理层做出,然后

向下交付,必要时以威胁、强制的方法执行,主管与部属间的接触在不信任气氛中进行。很显然,“仁慈式”较之“独裁式”相对富有活力。具体到汉唐的贤明式领导,总的来看,正如前文已经分析的那样,其政治较为清明,文化政策相对宽松。汉唐两代均没有像明清时期的那种血淋淋的文字狱,白居易的《长恨歌》直点皇帝,但皇帝对他却没有怎么样。应该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贤明式领导的确起了相当积极的作用。这里,特别需要看到的是,汉唐的贤君明臣普遍都具有较高的政治、文化素质。其君主求贤若渴,从谏如流;而臣子们则犯颜直谏,公而忘私。由这样一批高素质人员组成的领导层,为当时文化的繁荣发达提供了有力的保证。今天,我们并非认为汉唐的贤明式领导已经十全十美,更不是要提倡或实行这种贤明式的领导,而是透过它来强调高素质人才所组成的领导层的特别重要性。如果我们的各级领导都具有很高的素质,那么我们的事情显然要好办得多。

参考文献:

- [1] 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 [2]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3] 吕思勉.先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 [4] 司马光.稽古录[O].学津讨原本.
- [5]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M].上海:地图出版社,1982.
- [6] 黄留珠.周秦汉唐文明[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
- [7] 陈寅恪.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C]/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 [8] 孙达人.中国农民变迁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
- [9]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 [10] 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11]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3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 [12] 罗振玉.干禄字书笺证[O].上虞罗氏印本.
- [13] 熊明安.中国高等教育史[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3.
- [14]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15] 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4.
- [16] 张星娘.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2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7.
- [17] 郑家馨,何芳川.古代中国与东非人民的友好往来[C]/北京大学历史系亚非拉史教研室,北京大学东语系亚非历史组.中国与亚非国家关系史论丛.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

(下转第29页)

Formation of Chang'an Culture and some suggestions for its boosting

ZHU Shi-guang

(Institute of Chinese History and Geography,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Shaanxi,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regional range, historical background, main contents and existing situation of Chang'an Culture so as to explore its formation.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Chang'an Culture not only covers the regions in Qin Dynasty but also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and Tang Dynasty, and its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undergo 5 stages: live gestation, production, formation, flourishing and subsequent development. The main contents of Chang'an Culture include empire building, sacrificial ceremony, regional activities, discipline and arts, clothing and food, singing and dancing. The previous research results of it were rich, but its theoretical levels need to be improved. The author accordingly suggests that there should be strengthening work for the popularization and carrying forward of the research of Chang'an Culture and this cultures of Zhou, Qin, Han and Tang Dynasties so as to further put forward the thorough research of the ancient cultures.

Key words Chang'an Culture; Zhou, Qin, Han and Tang Dynasties; ancient cultur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上接第 24页)

Problems from Han and Tang Cultures

HUANG Li-zhu

(School of History and Museology,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Shaanxi, China)

Abstract The feats from Han and Tang Cultures and history were great and characterized by creativity, comprehensive, inclusivity and radiation. They also have wider connection with the exterior world and deeper significance in the world. All these have provided historical enlightenments, and they are the basic and important things to study.

Key words Chang'an Learning; Han and Tang Cultures; Chang'an Culture; historical enlightenment